

从行为习惯养成看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基于北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校的田野研究

樊秀丽¹ 姜方华¹ 张宗倩²

(1.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37; 2.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长春 130024)

【摘要】 家庭与学校作为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场域, 两者交往互动形成的社会环境是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土壤。本文以随迁子女为对象, 通过田野研究的方式, 回到“教育真实”, 以随迁子女的行为习惯养成为切入点, 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乡土家庭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的冲突、家庭卫生习惯与学校卫生规范的脱嵌、家庭语言习惯与学校规范语言的差异四方面, 对随迁子女行为习惯养成过程中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随迁子女而言, 由于其家庭与学校场域的异质性非常强, 如何使二者形成教育合力, 助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显得非常必要且重要。

【关键词】 行为习惯; 家庭; 学校; 随迁子女; 教育人类学; 田野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178(2018)03-0108-07

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18.03.01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人口的流动更加频繁。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 2015年,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 占总人口的18%。在流动过程中“家庭化”趋势愈加明显, 在流入地居留也愈加呈现出长期化和稳定化的特点。^[1]大量适龄儿童伴随着家庭的流动进入城市, 教育作为其在城市生活的核心问题,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北京作为重要的流入地城市之一, 有着相当数量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16》, 2015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133687人, 其中非京籍人数达到

448556人, 占总人数的39.6%。^[2]

小学阶段是培养和形成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时期。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仅是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条件, 也是其健全人格形成的基础, 能为人的一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自2013年9月起, 本课题组成员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 分别在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和石景山区的7所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中小学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走向“教育真实”, 回到教育的生活世界和文化背景, 从微观层面了解随迁子女在家庭和学校场域中行为习惯养成的真实状况。本文在对其中的“安小”(简称)和“玉小”(简称)两所学校进行田野研究的基础上, 讨论关于随迁子女“行为习惯养成”的问题, 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家庭、学校有着怎样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7-07-07

【作者简介】 樊秀丽(1962—), 女, 山东青岛人, 学术博士(广岛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

姜方华(1993—), 女, 山西阳泉人,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张宗倩(1995—), 女, 甘肃白银人,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 15BSH062)的阶段性成果。

(一) 安小低年级学部

安小低年级学部位于朝阳区,是一所公立小学,始建于1985年10月。最初是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建立的,主要招收本社区儿童。20世纪90年代,学校开始接受少量的随迁子女作为借读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原社区逐渐老旧,本地出生率下降,以及原有住户搬迁、划片学区范围调整等因素,从2000年开始,学校本地生源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入学就读。2015年4月,由于中小学资源整合,该校合并了其他4所学校。截至2016年4月,安小低年级学部共设三个年级,在读学生602名,非京籍学生占学校学生总数的53.7%。

(二) 玉小

位于石景山区的玉小是一所公办小学,始建于1980年9月,主要招收本社区儿童。2002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将该校定为石景山区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之一,以满足流动儿童就学的需求。2015年9月,根据石景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规划,将玉小整合纳入石景山实验集团,开始优先招收本地京籍学生,从“以服务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为主”转变为“首先满足本地区城市居民子女,空余学位由教委统筹安排外来人口学生”。截至2017年6月,全校共设6个年级,12个教学班,有345名学生,其中非京籍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96%以上。

课题组成员每周至少要有个工作日深入学校,实地参与观察学校的各项活动,聚焦观察一、二年级的课堂,访谈校长、教师、学生及家长等,获取第一手资料。

二、行为习惯养成的相关概念

所谓行为习惯,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不同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的影响,在语言和行而上形成的外显的、自动化的动作、行为方式以及反应倾向。近年来,通俗意义上的行为习惯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破专业、地域局限,几乎“人人可说”的公共议题,受到许多学科、不同领域的关注。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行为习惯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向个体的行为习惯,二是指向群体的行为习惯。

以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认为“环境是影响儿童行为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的行为习惯大多由后天学习得来,个体学习的实质是通过创设条件形成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连接,进而形成习惯。在培养习惯的过程中,主张按照“小步子接近”原则来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3](PP.131-144)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认为“行为习惯是社会学习的产物,儿童主要通过观察其生活中的重要人物而习得社会行为。”^[3](PP.145-148)

叶圣陶在论证教育与行为习惯的关系时表示,他认为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养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一切良好习惯”。^[4](P.229)

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习惯”多指某一地域内人们共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在集体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需要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率先将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习惯与物质社会的生活条件和社会集团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考察,论证了风俗、习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5]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共有的习惯》中将习惯看成是历经时间的变迁而遗传下来的“古迹”和行为规范,接近现在所指的“风俗”一词。^[6]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行为习惯的讨论体现在其“惯习”理论中,他认为惯习(habitus)是一种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惯习是实践活动及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生成于一定的条件制约与特定的生存条件,是历史的产物,行动者的既往经验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会处于优先地位,具有相对封闭性和滞后性。^[7]

生活中个人的行为习惯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是个人偏爱或选择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说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对行为习惯做出区分和判断主要在于它出现的时间、地点是否合适,在于它是否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学校作为主要的教书育人场所之一,承担着传播文化标准的重担。在学校场域中,制度化的《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2015年)作为行为规范教育的标准和指导性文件,对学生行为习惯加以区分和判断。国家和相关教育部门非常重视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早在1955年2月,教育部就颁布了《小学生

守则》,这是国家对小学生日常行为的最基本要求。1991年8月20日,在原有守则基础上又颁布了《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小学生的言语和行为的训练,促使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2015年,教育部颁布了最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为落实新的守则规定,次年,北京市教委研究制定了《北京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2016年修订)》,要求各学校要进一步明确培养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任务,深入开展行为规范教育,增强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学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新版本中剔除了部分抽象化、操作性不强的内容,提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如“勤奋学习、讲究卫生、举止有礼、衣着得体、行为端庄、自觉使用礼貌用语及体态语”等。^[8]

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学生形成有利于其成长和发展的良好习惯。儿童在长期的成长过程中,生物的个体缓慢地适应着周围的文化环境,逐渐形成某一社会文化环境所提供的文化行为习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各种行为习惯的养成,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学龄前儿童自幼儿前期养成的吃饭、排便、穿衣、睡眠、清洁等基本生活习惯以及通过游戏适应集体生活的好习惯。这些行为习惯可养成儿童的自律、责任感、协调性和自主性,是社会生活所必须具有的基础,也可称之为社会生活习惯。第二,是刚入小学的儿童需要适应学校生活,学会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随迁子女行为习惯养成的现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论教育》中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的每一样东西,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9]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比传授文化知识更为重要。与城市学生相比,随迁子女在物质条件、家庭环境、父母文化水平等多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距。同时,囿于年龄和个人阅历的局限,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好奇心重、模仿性强,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部分随迁子女自律自控能力差、学习积极性较低、卫生习惯不良、不服教育管理等不良行为的表现,不仅阻碍了其个人健康顺利地成长,更对其更好地与城市融合设置了重重障碍。

— 110 —

(一)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脱节

学习是学生在学校的主要活动,按时完成作业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以积极态度努力学习的重要指标。小学阶段的教育活动通常由学校和家庭共同实施,学生的部分作业需要由父母在家庭中监督、辅导完成。两所田野调查学校都建立了家校合作制度,学校在线上以家校通、微信群、电话等为交流工具,与学生家长联络;线下以学生评价手册、家长邀请函与活动通知回执的形式沟通。让“家长签字”成为教师与家长沟通的常用手段。学校还会不定期召开家长会,学校主管领导在会上直接说明希望家长配合的具体要求。安小校区主管在家长会上的发言如下:

希望家长配合的有以下五点:(1)在家督促、检查学生的学习习惯,不要造成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节;(2)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客观认识孩子的学习,全方位地关注孩子;(3)加大对孩子的培养力度,多买书,学一些特长,以便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4)让孩子保护眼睛,帮助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控制用眼时间,也要控制饮食,防止肥胖;(5)及时与学校沟通,学校也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教师无法全部都做得完美,尤其是品德、习惯与性格方面。(摘自2015年5月22日田野笔记)

家校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格。

家庭作业是教师指定学生在家中应该完成的作业。在我们田野研究的班级中,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罚抄课文、作业量加倍等惩罚性措施以及盖小红章、发放“七彩星”等奖励性措施来帮助、督促随迁子女完成作业任务,但无法按时完成作业仍然是随迁子女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甚至部分学生还用谎言来掩盖自己未完成家庭作业的事实。安小的一位班主任对笔者(信息采集者)诉说了她的无奈:

小翰一年级就开始不写作业。作为家长,一年级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打下夯实的习惯与基础,拼音会、字会,把字写好了。你说一年级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五天有四天不写作业,不是这个作业没写就是那个作业没写。孩子爸爸说让孩子在老家,妈妈不让,说要带在身边督促学习。我认为你想带好,你得豁出去,你得管,不要说你又回家完了,这样你还是没有起到带在身边的作用。还

有更什么的,他爸要是周五接走,搁爷爷那儿,他就一个字不写。我告诉他作业是什么,他爸看着他抄的作业,到最后也没写。后来我说这就是极品家长,那能怎么办,你能让家长怎么着呢?有时间放个小长假,留点作业,看看课外书,写个小日记,做个摘抄啊,他就都不写。问他妈妈,就说爸爸给带回老家了。……学校发的表也都不填,一些重要的信息你给它填齐了呀。往往放假返校前两天,哎,找不着人。打电话,您家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有来上学,说“哎呀,不好意思,忘了开学了。”这哪能忘,放假前给每一个孩子都订了一打假期注意事项,里边就有开学时间,说没有看到。这孩子只是放在自己身边也不行啊,得管啊。(摘自2015年4月24日田野笔记)

班主任对所谓的“极品家长”饱含着无奈,虽然学校要求学生家长给予配合,但家长们往往忙于生计,无暇监督学生的家庭作业完成情况。

上述的案例也同样出现在玉小。

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看到桌子上的暑假作业,想起来小杰的事,对我(信息采集者)说“小杰啊,一个暑假,那暑假作业就在自己的书包里没有拿出来过,快开学了才说还没写。”

班主任接着说:“他家长才不管呢,他妈妈还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小杰没有写完作业,说别太批评他,没写完就没写完吧。你说父母都这样,没法说。”(摘自2016年9月1日田野笔记)

家长对孩子不完成作业的行为采取错误的认知和纵容态度,不仅导致教师正常的教育行为无法有效实施,同时还助长了孩子不按时完成作业的不良习惯。

我们访谈了玉小几位学习上有困难的六年级学生,问他们学习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求助时,学生们无奈地回答(在家)问谁”“他(某位学生)是他们家学历最高的,呵呵,小学六年级是家里学历最高的。”(摘自2015年11月19日田野笔记)进城务工人员“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其子女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从家庭获取有效的辅导和支持,间接导致了空白作业本的出现。

对随迁子女来说,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异质性被放大,学校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和措施帮助随迁子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当他们回到家后,却无法得到有效的延续和强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脱节致使教育的合力无法

形成。

(二)乡土家庭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之间的冲突

不同的文化脉络会形塑出不同的行为模式、知识结构和文化规则。进城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之前多生活在处于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在以往传统礼俗社会的前生活经历使他们衍生出相对直接、粗放、不拘小节的行为习惯和话语模式。^[10]受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常常租住在条件相似的同一区域,与城市居民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其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阻碍其固有的传统惯习的转变,形成异质文化共存的状态。^[11]同时,惯习的转变还有赖于个体相当的知识与能力的支持,“文化资本”的缺失阻碍了进城务工人员自身惯习的转变。

学校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奖励机制,试图从多方面帮助、促进随迁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我们访谈玉小校长时,她这样说道:

我们的教材啊,什么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常规工作中,我们的起点设置得比较低,比如说在一些文明如厕啊、吃饭啊这些细节、讲卫生啊这些方面,在日常的教学中比较注重这个,在习惯养成教育这方面上的比例上要重要一些。(摘自2017年6月27日田野笔记)

异质文化共存的生存环境使随迁子女的文化化和社会化过程出现冲突。小女孩对参加家校活动的妈妈所说的“妈妈,你没冲厕所!”(摘自2016年5月27日田野笔记)展示出随迁子女家庭文化和学校文化之间的差异。

家庭是少年儿童进行文化化和社会化的初始环境,家庭成员所保有的惯习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这种影响折射到课堂上,体现在随迁子女身上出现的自控能力较差、动作随意、爱讲小话、交头接耳等行为。在课堂中随意站立、走动,打扰他人听课,这不仅干扰了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而且也分散了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导致了随迁子女的学习困难。

小玉一节课的时间都在观察着小嘉的一举一动,趁着小嘉起来读课文或者回答问题的空隙,同时躲避老师的视线。小玉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前爬,伸手去拿小嘉放在桌兜里面的英语本,来

回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摘自2016年9月22日田野笔记)

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小富突然半趴在桌子上,手在凳子底下扣着什么。笔者(信息采集者)仔细一看,小富竟然把鞋脱了露出双脚,用手在抠自己的脚丫子。不一会儿,竟然把鞋整个都脱下来,侧着身子,把未穿鞋的脚丫子踩在暖气管上。(摘自2017年3月13日田野笔记)

上述两个片段中所呈现的画面是部分随迁子女课堂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课堂中,身体作为个体所受社会文化的载体,不再是纯生物性躯体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处于社会情景中的身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它的“当前”折射出“过去”的影子,显示着学生从原生家庭文化中所带来的一套行为系统。随意、粗放的行为模式与严肃认真、涵养文化素养的课堂要求格格不入,其本质是随迁子女自身所携带的“乡土文化”与流入地“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

(三) 家庭卫生习惯与学校卫生规范的脱嵌

习惯是人在一定情境下自动化去进行某种动作的需求或特殊倾向。^[12]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习惯的奴隶,利用长期养成的习惯,并最终因习惯受益或受害。安小为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每个班级教室里都备有洗手液、护手霜、卫生纸与湿纸巾。班主任会提醒学生饭前洗手、饭后擦桌子,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虽然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环境条件,但我们在田野观察中发现,随迁子女并未真正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笔者(信息采集者)在与小翰聊天时,发现他的手有点皴裂,于是挨个询问了班里其他学生是否洗脸擦油。全班28位同学中只有1位同学没洗脸,有7位同学没有擦油,其中包括3位女生。(摘自2015年10月8日田野笔记)

玉小校长这样评价学校随迁子女的卫生习惯:“我觉得啊,他们的卫生习惯问题(比较大)。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学校有脱节的情况。比如学校的环境比较现代化,比较规范。但他们住的地方条件好的可能居住在楼房,也可能住得比较拥挤,一些生活习惯和咱们学校不一样,比如包括他们洗澡吧,所以卫生习惯差一点。”(摘自2017年6月19日田野笔记)

朱熹曾在《童蒙须知》中写道“大抵为人,先

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13]玉小学生小鸿的双手黝黑,指甲里满是泥土,脸颊、胳膊的皮肤明显皴裂,还附着一层白色的皮质,平日所穿衣服不仅样式少,而且看起来不够干净整洁。仪表仪容上的“与众不同”使小鸿常常受到老师的“关注”。班主任无奈地说:“以前就和他父母说过,没用。他们一家都这样,他妈妈那头发油着呢。”(摘自2017年5月8日田野笔记)

学校的课间活动时间是学生们最开心的时刻,在我们的田野观察中发现追逐打闹、在地上劈叉、趴倒、爬行等时常出现在随迁子女的课间游戏当中,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互相追逐推搡、大声喊叫。三年级一位班主任说“就不敢转眼,一会儿看不住就满地打滚。”(摘自2016年11月17日田野笔记)

儿童游戏中所显露的游戏行为与个人的现实生活环境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学生小玉曾在聊天过程中向笔者讲述回到老家后的游戏活动,包括跳麦秸、在门前的土坑中顺坡滑等。由此可见,随迁子女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无意识坐下、趴下、在地面打滚等与大地保持“亲密”接触的动作多处于原生态的自发状态,是其自身惯习系统中已经存在并得到认可后自动化的动作与行为。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基于文化前提的必然反应就像机体决定的反应一样,是不由自主的,它们就是文化决定的反应,构成了我们许多下意识的行为方式的主要部分,个人的发展也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活条件共同决定的。”^[14]随迁子女进城前的生活经历,形成了其缺乏组织性与规范性的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的养成贯穿人的一生,而小学低年级阶段的习惯养成至关重要,模仿与服从是此阶段学生最大的特性,家长与教师作为权威性成人,对他们的行为习惯养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在行为习惯的养成上,家庭与学校必须形成合力,帮助学生在两个场域中实现统一。

(四) 家庭语言习惯与学校规范语言的差异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基本符号之一。英国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认为,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形成了不同的符号编码方式的语言,并在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甚至社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城市学校场域中使用的多为抽象程度较高、表达方式较复杂、语义完整的精致型符码,而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多使用限制型符码,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往往词汇贫乏、句法简单、层次混乱,更依赖于具体形象,抽象化程度较低,很难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图。^[15]在我们的田野研究中,学生家长的学历从小学到本科不等,但低学历所占比例大,其中初中学历比例占一半多。2017年6月,本课题组对朝阳区、石景山区4所小学进行了问卷调查,从回收的353份非京籍学生问卷中了解其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看,随迁子女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其中父亲未受过教育或仅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为72.3%,母亲未受过教育或仅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占比高达76.9%。在这些家庭中,由于父母语言结构简单,词汇相对匮乏,直接影响到教学场景中子女的语言使用。在玉小的一节语文课上,老师要求给生字“去”组词时,学生小浩的第一反应是“去一边去”,而不是通常所列举的“来去”“去留”等相对精致的词汇。

小富时不时还冒出两句“你大爷的”“去你大爷的”之类的脏话,笔者(信息采集者)问他这些话都是从哪听来的,和谁学的,起初他很敷衍地说“跟老师啊!”我追问他哪个老师教他这样说话时,小富才说“跟我妈学的,她就是个文盲!”(摘自2016年11月17日田野笔记)

对于不文明语言的生成,玉小校长颇有感慨地说:家长文化水平和京籍的没法比。……耳濡目染的东西,比如平时我们聊天会引经典或找些精练的语言去说,这些家长不会。他们就是用特别粗浅的大白话,甚至直接打骂孩子。(摘自2014年4月14日田野笔记)

通过与小富的交谈,追溯到他的不文明语言主要源于家庭的影响。随迁子女在与家长生活的过程中,孩子会潜移默化受到家长不经意间表露出的不文明用语的影响,并习得父母的部分言谈举止和思维模式。因此,家长无意识的不文明话语和行为可能会阻碍孩子良好文明习惯的形成。

四、结语: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家庭与学校在

培养随迁子女的行为习惯养成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异,包括各自优先考虑的问题、要满足的需求和期望、与儿童互动的特定方法和形式,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各自携带的文化和语言差异。同时,不同家庭所依据的生活环境也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与家庭所处的文化社会(城市或乡村)、社会经济状况、所属文化群体有密切关联。

环境差异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这样的事实,即儿童生活的特定环境将影响其行为习惯、知识和技能的发展。由于家庭文化环境与学校文化环境不同,因此,所有的儿童都要经历家庭活动与学校活动的不断变换,因而一些儿童会产生不适应学校环境的问题。如果家庭传递给儿童的行为习惯、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念与学校的要求相距甚远,那么,儿童的学校适应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尽管家庭和学校之间存在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即期望儿童得到最佳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父母通常会承担起基本的职责,包括提供食物、衣物、营养以满足儿童身体发展的需要;传授给子女社会生活的基本行为习惯、生存技能;积累资金以供子女接受学校教育。而学校承担的职责则是为儿童提供适合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以及与学生的需要、兴趣、学习方式相适应的课程。

本课题组成员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部分随迁子女家庭很难满足儿童的基本需求,进城务工人员普遍因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时间较长且不稳定、生计压力大、多子女家庭等因素,无足够的机会与良好的条件教育子女,进而导致家庭对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的支持力度也大为削弱。学校难以结合随迁子女在家庭场域中的行为表现给予及时的反馈,随迁子女行为习惯养成链条被打断,极易造成“5+2=0”的极端情况,且生活场域与认可标准的变化使得随迁子女无法形成心理安全感,从而难以形成与城市现代文明相吻合的行为习惯。所以,对于随迁子女的行为习惯培养而言,由于家庭与学校两大场域多方面的异质性,两者必须互通信息,形成教育合力,打通场域之间的区隔,以期随迁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供一致、安全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内容概要[J]. 青春期健康: 家庭文化, 2016(11): 90-91.
- [2]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 北京统计年鉴·2016 [EB/OL]. <http://www.bjstats.gov.cn/nj/main/2016-tjnj/zk/indexch.htm>, 2016-10.
- [3] 陈琦, 刘儒德. 当代教育心理学[M].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7.
- [4] 叶圣陶. 叶圣陶集[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1: 228.
- [5] 赵振杰. 习惯教育论: 一种教育哲学的思考向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53-55.
- [6] 汤普森. 共同的习惯[M]. 沈汉, 王加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49.
- [7] 布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 译. 译林出版社, 2003: 82.
- [8] 北京市教委. 北京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2016年修订) [EB/OL]. <http://zhengce.beijing.gov.cn/library/192/33/50/40/438651/140571/index.html>. 2017-01-05.
- [9]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M]. 许良英, 赵中立, 张宣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46.
- [10] 何颖. 惯习区隔与政策壁垒北京市公立学校随迁子女文化融合困境的人类学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16(4): 21.
- [11] 王微. 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惯习障碍[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08(9): 60-61.
- [12] 朱智贤主编. 心理学大词典[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728.
- [13] 孙云晓. 习惯决定孩子一生[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0.
- [14] 茨达齐尔. 教育人类学[M]. 李其龙,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69-70.
- [15] 周旻. 从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谈学校教育的再生产本性[J]. 外国教育研究, 2016(4): 25-3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Reflected by Habit Development——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chools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FAN Xiu-li¹, JIANG Fang-hua¹, ZHANG Zong-qian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2. Institute of China's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In students' development, family and school are the two major field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ormed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s is the important soil for their habit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as subjects,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field study and make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in the habit 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by returning to educational reality and focusing on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local family culture and urban school culture, the disjoint between family health habits and school health regul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mily language habit and school standard language.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hen family and school form joint educational force with their strong field heterogeneity, they can facilitate children's habit development, which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Key words] behavior habit;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field investigation

(责任编辑 李 晓)